

内蒙古中南部与东南部地区东周时期含畜牧业成分诸遗存的葬俗比较及相关问题^{*}

王立新 胡平平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大致包括北至阴山，南抵鄂尔多斯高原南缘，西起包头，东达黄旗海左近的区域^[1]。内蒙古东南部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燕山以北，辽河以西，是指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辖内的广阔地区^[2]。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3]。而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分别位于这个文化带的中段和东段。

内蒙古中南部东周时期含畜牧业成分遗存^[4]发现较多，研究也较为深入，而东南部地区发现则寥寥无几。近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发现的以井沟子西区墓葬为代表的井沟子类型，发掘者称其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辅以渔猎，可能属于一种季节性游牧的生产方式^[5]。这一发现不仅为寻找东胡遗存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6]，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含畜牧业成分诸遗存的对比研究，可探讨它们在经济类型、社会组织乃至意识形态上的区域性差异。

为此，本文将以一个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葬俗^[7]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比上述两个地区东周时期的含畜牧业成分诸遗存，试图对经济类型的区域差异进行探讨，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解释。

一、区域葬俗对比

1.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这个区域内含畜牧业成分遗存的特征比较复杂，学者们以不同的标准尝试对其进行类型或文化上的分类。田广金先生通过对墓葬形制、葬俗及随葬器物的分析，将这个区域内的游牧性质遗存划分为阴山南麓的“毛庆沟类型”、鄂尔多斯地区的“桃红巴拉

^{*} 此项研究得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2009JJD780004）资助。

类型”和包头地区的“西园类型”^[8]。杨建华先生根据葬俗的划分所得出的认识与田先生类似,但认为“东部岱海地区还可以再细分为蚩汗山以南的毛庆沟与饮牛沟类型和蚩汗山以北的崞县窑子类型”^[9]。乌恩先生则将前两个类型改称“毛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10]。林沄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地带北方民族遗存可以分为六个区,其中,毛庆沟、饮牛沟与崞县窑子隶属于“阴山东段的山前地区”,桃红巴拉、西沟畔、玉隆太等划入“河套内的东北部地区”,而“内蒙古阴山西段地区”仅有呼鲁斯太墓地^[11]。笔者之一曾综合各家意见,从包括墓葬形制结构、墓向与殉牲习俗在内的葬俗——这一最能体现文化传统的综合性指标出发,将区域内以畜牧业为特征的遗存划分为四种类型:西园类型、崞县窑子类型、毛庆沟类型及桃红巴拉类型。本文即从后一种分类。

西园类型包括包头西园^[12]、和林格尔新店子^[13]、清水河县阳畔^[14]及西嘴子墓地^[15]。崞县窑子类型除凉城崞县窑子墓地^[16]外,凉城忻州窑子^[17]亦归入此类型。毛庆沟类型除毛庆沟墓地^[18]外,还包括经两次发掘的凉城饮牛沟墓地^[19]。桃红巴拉类型包括桃红巴拉墓群、公苏壕M1^[20]、准格尔旗西沟畔M1~M3^[21]和玉隆太残墓^[22],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

各类型墓葬基本情况如表一。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信息:①崞县窑子类型和毛庆沟类型的墓葬总数要远远多于其他两个类型,唯一例外的新店子墓地亦靠近毛庆沟墓地。一般来说,墓地规模大不仅仅说明所对应的人群规模较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墓地的延续时间较长,也即意味着定居性较强。②墓葬形制上,西园类型中存在的洞室墓和偏洞室墓非常独特,就渊源而言,有人认为洞室墓来源于陇山地区,偏洞室墓的源头则可追溯至分布于甘肃中部的沙井文化^[23]。③墓葬朝向上,西园类型和桃红巴拉类型朝北或东北,崞县窑子类型和毛庆沟类型则以东西向为多。而且毛庆沟类型存在南北向墓葬。在毛庆沟墓地,南北向的墓均位于山坡下,是在墓地的偏晚阶段才加入该人群的,从数量上少于东西向墓。而到了饮牛沟墓地阶段,南北向墓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东西向。考虑到随葬品方面,从毛庆沟到饮牛沟,似乎来源不同的两个集团的葬俗有日趋融合的趋势^[24]。④崞县窑子类型和毛庆沟类型均流行设头龕和二层台,尤以忻州窑子为甚。⑤葬具以毛庆沟类型发现的为多。⑥各地葬式绝大部分都为单人仰身直肢,但不乏一些例外。

各类型墓葬都存在殉牲习俗,其具体情况见表二。在殉牲墓的比例上,处岱海地区的崞县窑子类型和毛庆沟类型明显低于处河套地区及阴山南麓的桃红巴拉类型和西园类型。殉牲种类上,虽然各地都以羊、牛、马为主,但具体情况存在一些差异。相比较而言,崞县窑子类型和毛庆沟类型马的数量要少于其他两个类型,而且都存在用猪、狗殉葬的情况,这说明它们可能存在定居农业。毛庆沟晚期牛的比例上升,而牛无需长时间、大范围移动以觅食,这也说明其移动性减小。值得注意的是,西园墓地的马都发现

表一 内蒙古中南部各类型墓葬的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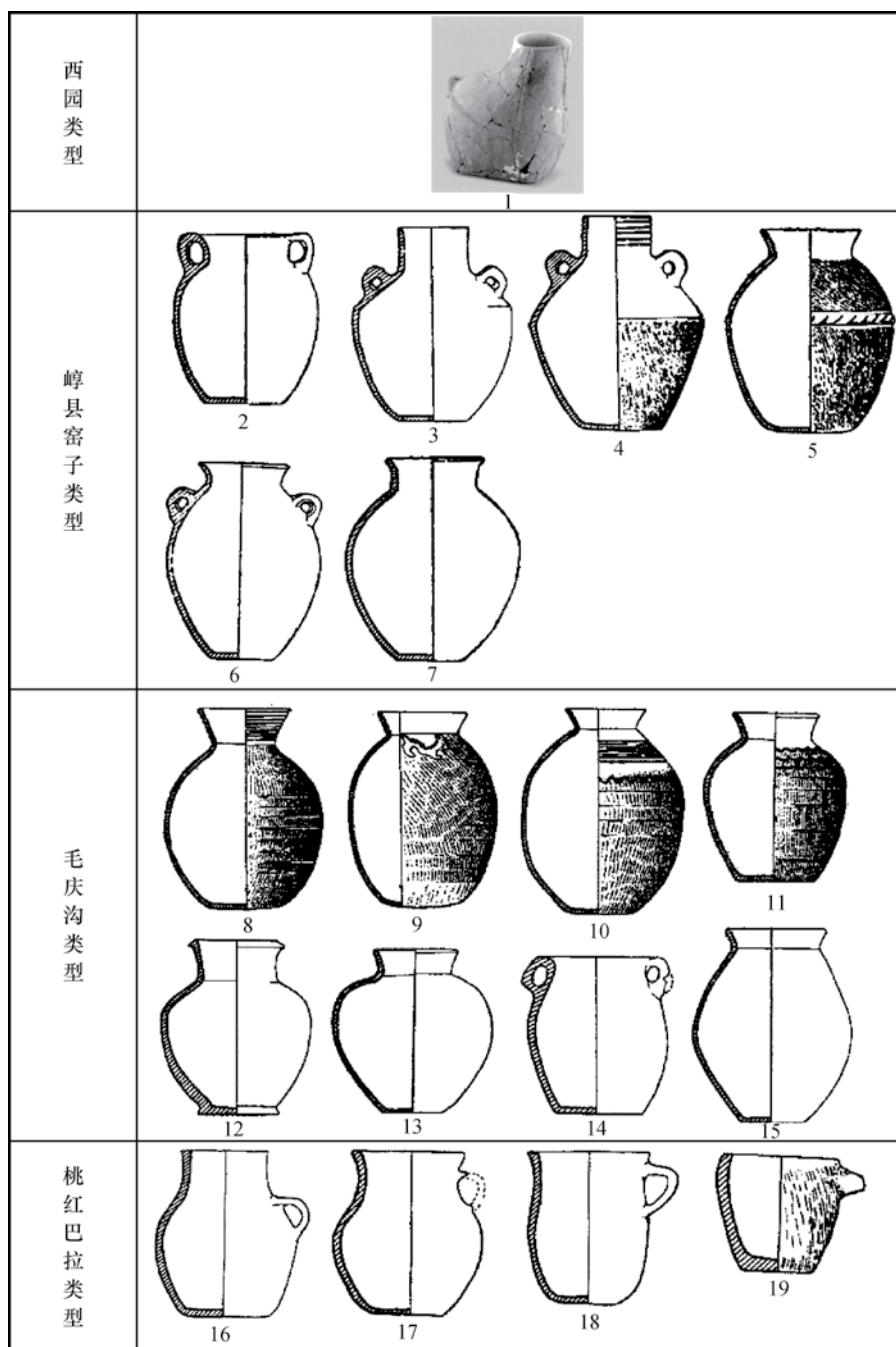
类型 特征	西园类型				崞县窑子类型		毛庆沟类型		桃红巴拉类型		
	西园	新店子	阳畔	西嘴子	崞县窑子	忻州窑子	毛庆沟	饮牛沟	桃及公M1*	西沟畔	玉隆太
墓葬总数	7	56	6	3	25	69	79	38	7	3	1
墓葬形制	偏洞室6 土坑竖穴1	土坑墓20 洞室墓20 偏洞室11	洞室墓6	洞室墓3	土坑竖穴25	土坑竖穴69	土坑竖穴79	土坑竖穴38	土坑竖穴7	土坑竖穴3	
墓向	62° ~ 70°	东北为主			53° ~ 85°	50° ~ 101°	东西向67, 南北向12	东西向16, 南北向22	北或东北	北	
头龕	无	无	无	无	6	12	东向4	无	无	无	无
二层台	6	有	无	无	2	10	南北1	南北2	1	无	无
头龕与二层 台皆有	无	无	无	无	2	18	无	无	无	无	无
葬具	无	无	无	无	无	1	南北3 东向1	东西4 南北10	无	无	无
葬式	单人仰身 直肢5、 侧身屈肢1	单人仰身 直肢为主, 极少数为侧 身屈肢或侧 身直肢			单人仰 身直肢	单人仰 身直肢	仰身直 肢69、 俯身直 肢1	单人仰身 直肢34、 仰身屈肢2	单人仰 身直肢	单人仰 身直肢	单人仰 身直肢

注：标“*”处为“桃红巴拉及公苏壕M1”的简称。

表二 内蒙古中南部各类型墓葬的殉牲情况

类型 特征	西园类型				崞县窑子类型		毛庆沟类型		桃红巴拉类型		
	西园	新店子	阳畔	西嘴子	崞县窑子	忻州窑子	毛庆沟	饮牛沟	桃及公M1*	西沟畔	玉隆太
殉牲墓比例	100%	84%			72%	66.7%	50%	33.3%	100%	100%	100%
种类和数量	马、牛、羊头骨, 羊最多	马18、牛93、羊头骨253	马、牛、羊头骨		马、牛、羊、猪、狗和马鹿头蹄, 羊最多, 次为牛	马7、牛31、羊125、猪7、狗3	羊57、牛15、马4、狗3	猪6、羊6、狗3、狐4	羊44、马12、牛8 (桃M1和M2)	马、羊	马、羊
殉葬动物骨骼	个别墓有羊肩胛骨和蹄骨	散布牛肩胛骨	少量蹄骨		羊下颌骨、羊矩骨和羊肩胛骨		羊肩胛骨	羊肩胛骨、肋骨			
摆放位置	摆放在二层台上, 牛头在前, 羊头在后, 牲头吻部朝前, 与墓主人头向一致	整齐排列在墓道、墓坑填土内, 头骨倒置或侧置, 吻部朝前	洞室人骨上方, 或正置或侧放, 无一定规律		牲头位于人骨头端, 成排横置, 下颌朝上, 或侧放倒置, 吻部向前, 蹄骨位于头骨周围	牲头多成排摆放在人骨头端, 多下颌朝上, 吻部向前。部分蹄骨散落在牲头间	牲头多置于人骨头端, 下颌朝上, 吻部朝前	牲头多置于人骨头端, 下颌朝上, 吻部朝前。其他部位位于棺外	人骨架上方墓葬填土中, 层层叠压	人骨左侧	

注: 标“*”处为“桃红巴拉及公苏壕M1”的简称。



图一 内蒙古中南部各类型含畜牧业成分遗存出土陶器情况

1. 陶偏口壶 (新M47 : 1) 2. 双耳罐 (崞M15 : 1) 3、4、6. 双耳壶 (崞M13 : 1、崞M20 : 1、崞M9 : 1)
 5. 绳纹罐 (崞M28 : 1) 7. 素面罐 (崞M17 : 1) 8~11. 绳纹罐 (毛M45 : 6、毛M44 : 4、毛M63 : 7、毛M37 : 1) 12、13、15. 素面罐 (毛M35 : 1、毛M23 : 1、毛M61 : 1) 14. 双耳罐 (毛M64 : 1) 16、17. 单耳鼓腹罐 (西M3 : 3、桃M2 : 1) 18. 单耳筒腹罐 (桃M1 : 1) 19. 单把杯 (桃M2 : 1)

(崞: 崞县窑子; 毛: 毛庆沟; 西: 西沟畔; 桃: 桃红巴拉; 新: 新店子)

于祭祀坑中,不见于墓葬中,这是否代表了对马的重视?崞县窑子发现的马鹿和饮牛沟狐狸的存在,都暗示狩猎是当时的一种生业方式。许多墓地都存在以动物肩胛骨、肋骨、肢骨等部位随葬的情况,有人推测这为肉食随葬的习俗,从性质上与草原牧人以动物头蹄代表整牲的方式存在很大不同^[25]。牲畜摆放方式上,西园类型由于存在偏洞室墓和洞室墓,牲头多摆放在墓圪的填土内或二层台上,多侧置或倒置,吻部与人骨头向一致;桃红巴拉类型则将牲头摆放在人骨架上方的填土中,层层叠压;崞县窑子类型和毛庆沟类型雷同,都是位于人骨头端,下颌朝上,吻部向前,与墓主头向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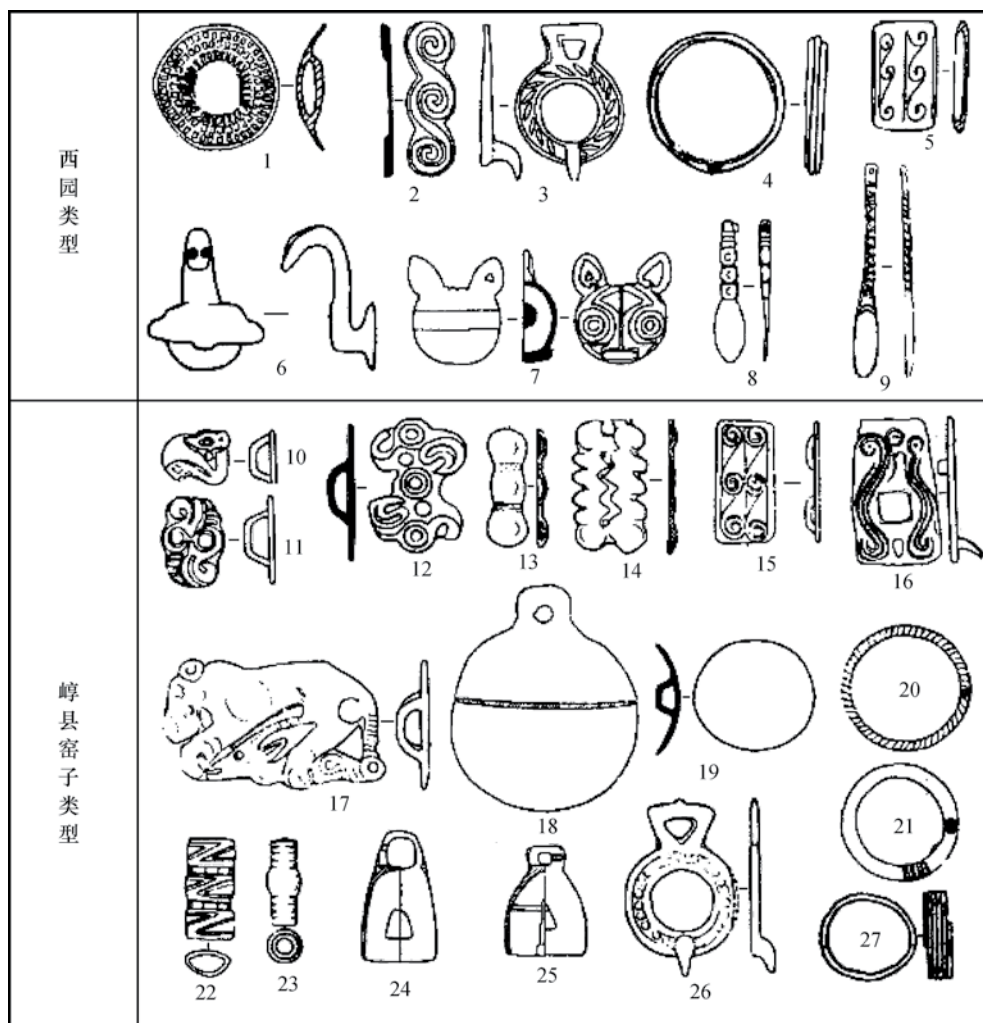
各类型墓葬都发现有独具特色的随葬品,种类包括陶器、服饰品、武器工具、车马具等,而无一例外的都以服饰品为大宗。各类型随葬陶器情况见图一。崞县窑子类型和毛庆沟类型均流行随葬陶器,其他两者则比较罕见。崞县窑子共出土陶器28件,忻州窑子53件陶器出于52座墓中,基本一墓一件。在偏东的崞县窑子与毛庆沟类型中,受中原尤其是晋文化影响出现的绳纹系陶器占有较大比重,而素面红褐陶系的陶器不仅比重量较小,而且似有愈晚愈少的趋势。在偏西的两个类型中,陶器自始至终都很少见,或许暗示出陶器在西部区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未扮演重要的角色。崞县窑子类型陶器以素面为主,另有绳纹、弦纹、刻划纹等。器类以双耳罐、双耳壶、鼓腹罐为多。毛庆沟类型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一种波浪折线纹。器型以绳纹鼓腹罐为大宗,另有素面罐和双耳罐。桃红巴拉类型出的少量陶器器类有大口筒状单把罐和碗,夹砂褐陶,素面,火候很低。

服饰品方面,扣饰、联珠状饰、管状饰、铜泡、各种材料的串珠是各地出现频率较高的种类,但各地亦有一些差异(图二、图三)。如毛庆沟类型特别重视对腰带的装饰,组成腰带的构件非常繁杂,有带扣、带钩、环、双鸟纹饰牌、鸟形饰牌、虎形牌饰、联珠状饰、扣饰、兽头饰、回纹饰牌、多孔饰牌和动物纹长方形饰牌等,尤以各种形制的饰牌最为独特,少见其他地区。同时,毛庆沟类型出有中原的带钩,而且凡出于南北向墓内的带钩,多数被砸成两段,首尾分离,分别葬于死者头上和足下。偏晚阶段,西沟畔出土虎猪咬斗纹金饰牌和各种金饰片。

武器工具方面,器类主要有铜短剑、铜刀、铜镞、骨镞、铁鹤嘴斧、弓弭等(图四)。有研究表明,双鸟回首剑和鹤嘴斧都有一个从甘宁地区自西向东的传播趋势,因此岱海及邻近地区出现的鹤嘴斧多为铁制^[26]。崞县窑子墓地的长铤骨镞和弓弭颇具特色,不见于鄂尔多斯各墓和毛庆沟墓地。而且该墓地不随葬除弓箭以外的其他武器,这一点不同于其他三个类型,却与后来典型匈奴墓葬的葬俗有明显相似性。

车马具以桃红巴拉类型最为发达,其他类型比较少见。种类包括马衔、马镫、马面饰、刷柄、扁环、兽形竿头饰、轴头、喇叭形器等,而不见岱海及邻近地区的节约。

综上所述,在墓葬形制、殉牲情况、随葬品等方面,以上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对于这四个类型的差别,杨建华先生以桃红巴拉和毛庆沟为例,将之归纳为内蒙



图二 内蒙古中南部各类型含畜牧业成分遗存出土服饰品情况（一）

1. 铜泡（西M6：10） 2. 联珠饰（西M6：11） 3. 带扣（新M20：1） 4. 耳环（西M3：4） 5. 长方形铜带饰（西M5：4） 6. 带钩（西M5：3） 7. 虎头形泡饰（新M43：11） 8、9. 匙形饰（新M47：12、西M6：2） 10~12. 鸟纹牌饰（崞M2：1、崞M12：4-5、忻M53：6） 13、14. 联珠饰（崞M22：8-1、崞M12：2-2） 15. 长方形牌饰（崞M24：8） 16. 带扣（崞M8：5） 17. 虎纹牌饰（崞M12：2-2） 18. 镜形饰（崞M22：6-1） 19. 铜泡（忻M29：31） 20、21. 铜环（崞M31：3、崞M12：3-2） 22、23. 管状饰（忻M13：7、崞M1：4-3） 24、25. 铜铃（崞M3：2、崞M22：7） 26. 带扣（崞M5：6） 27. 铜耳环（崞M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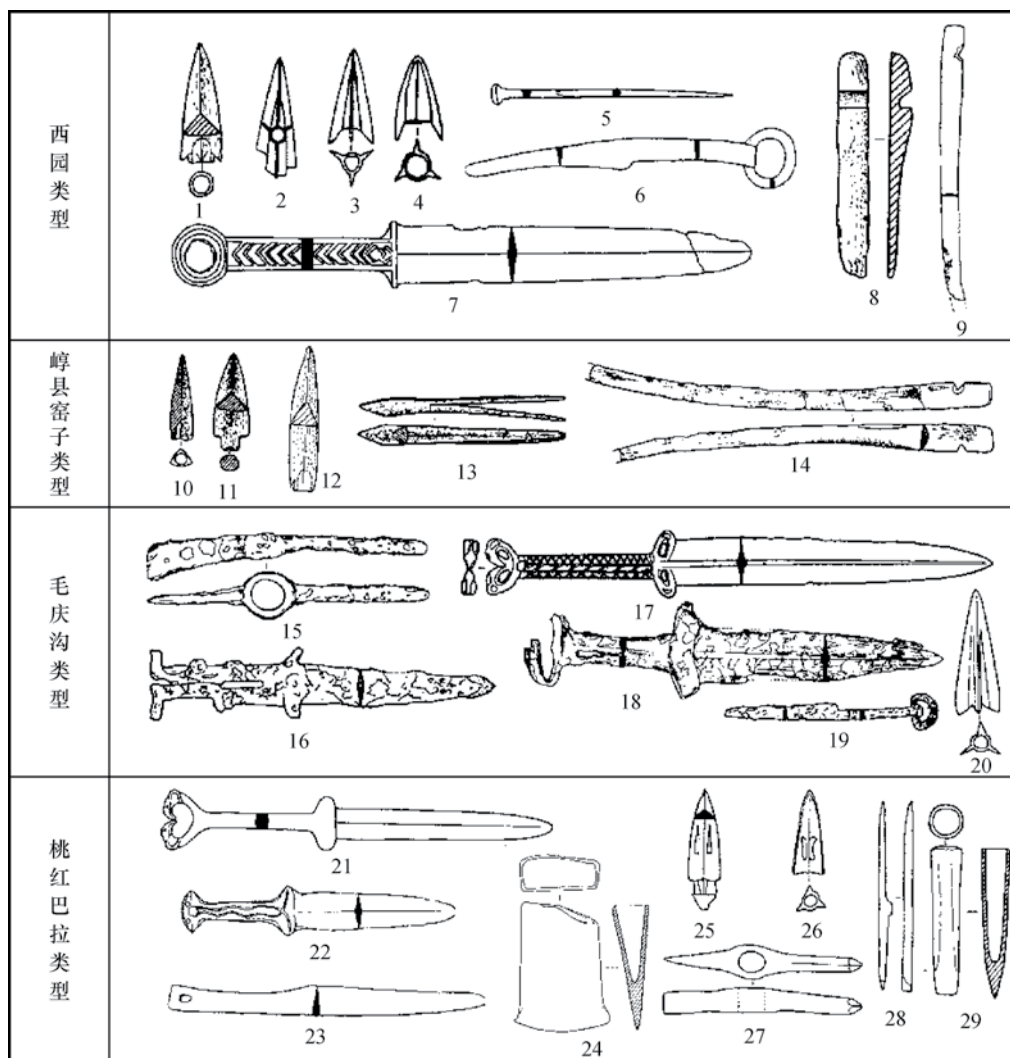
（崞：崞县窑子；忻：忻州窑子；西：西园；新：新店子）

古中南部东西区的差异^[27]，较有代表性。墓地规模上，东部以大型墓地的形式存在，而西部则是零星的发现；毛庆沟墓地附近甚至发现有窑址；殉牲墓比例西部明显高于东部，且西部对马较为重视，东部则发现有猪和狗殉葬；西部有发达的车马器；以上种种都表明，经济类型上，东部的游牧化程度没有西部高，游牧范围不大，有着较为固定的牧区，而且毛庆沟、崞县窑子墓地可能存在定居农业。对新店子墓地出土人骨的肢骨研



图三 内蒙古中南部各类型含畜牧业成分遗存出土服饰品情况(二)

1. 带扣(毛M59:9) 2、3. 双鸟纹饰牌(毛M7:2-5、毛M63:1-1) 4. 联珠饰(毛M2:4) 5、6. 管状饰(毛M10:5、毛M6:7-3) 7. 鸟形饰牌(毛M61:3-2) 8. 兽头饰(毛M2:7) 9. 铜泡(毛M47:9) 10. 铜针管(毛M10:4-1) 11、12. 带钩(毛M58:7-1、毛M53:1) 13、14. 虎形饰牌(毛M55:4、毛M74:5) 15. 铜铃形饰(毛M39:6) 16. 长方形饰牌(桃M5:7) 17、18. 双鸟纹饰牌(桃M1:31、公M1:8) 19. 带扣(桃M2:6) 20. 几何纹饰牌(玉2222) 21. 联珠饰(玉2223) 22. 兽头饰(桃M1:29) 23. 鹿形竿头饰(西M2:9) 24. 铜圆牌饰(玉2254:1) 25. 铜鹤头饰件(西M2:72) 26. 管状饰(桃M5:9) 27. 铜泡(桃M1:30) 28. 铜马面饰(公M1:8) 29. 怪兽纹金饰片(西M2:29)
- (毛:毛庆沟;桃:桃红巴拉;西:西沟畔;玉:玉隆太;公:公苏壕)



图四 内蒙古中南部各类型含畜牧业成分遗存出土武器工具情况

1. 骨镞 (新M11 : 11) 2~4. 铜镞 (新M41 : 4、新M43 : 4、西M5 : 18) 5. 铜锥 (新M37 : 1) 6. 铜刀 (新M24 : 1) 7. 铜剑 (新M41 : 1) 8、9. 骨弓弭 (新M20 : 8、西M4 : 9) 10~13. 骨镞 (崞M6 : 1-1、崞M21 : 5、忻M45 : 15、崞M14 : 6) 14. 骨弓弭 (崞M2 : 6) 15. 铁鹤嘴斧 (毛M38 : 1) 16、18. 铁短剑 (饮M1 : 2、毛M38 : 4) 17. 铜短剑 (毛M70 : 3) 19. 铁刀 (饮M1 : 4) 20. 铜镞 (毛M6 : 5-2) 21、22. 铜短剑 (公M1 : 5、西M3 : 1) 23. 铜刀 (桃M5 : 1) 24. 斧 (公M1 : 3) 25、26. 铜镞 (玉2224、西M3 : 19) 27. 铜鹤嘴斧 (公M1 : 1) 28. 铜锥 (公M1 : 2) 29. 凿 (公M1 : 4)

(新: 新店子; 西: 西园墓地; 崞: 崞县窑子; 毛: 毛庆沟; 饮: 饮牛沟; 公: 公苏壕; 西: 西沟畔; 桃: 桃红巴拉; 玉: 玉隆太)

究表明, 这里的男性居民的上肢粗壮程度明显强于下肢^[28], 这显然与长期的骑马游牧生活有关。

此外, 内蒙古中南部的凉城小双古城墓地^[29]、呼鲁斯太墓群^[30]和沟里头墓葬^[31],

它们虽然都为含畜牧业成分遗存,但不宜划入上述任何一种类型。同时,该地区除了这些含畜牧业成分遗存之外,还并存着一些与三晋文化系统关系密切的定居农业文化。对此,笔者之一认为,“自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区,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在经济形态上,虽然在赵、秦势力到达之前游牧业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产业,但是仍然在局部地区并存着农牧兼营的经济甚至于农业经济,该区域并未被全盘游牧化”^[32]。

2. 内蒙古东南部地区

夏家店上层文化结束以后,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文化格局同样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目前可判别的有水泉文化^[33]、铁匠沟墓葬^[34]、五道河子墓葬^[35]、敖汉旗周家地墓地^[36]及最新发现的林西井沟子类型^[37],它们虽然年代相当,但彼此的来源、性质有明显差异。其中,含畜牧业成分遗存随葬品的情况如图五。

水泉墓地位于敖汉旗南部四家子镇水泉村西约500米的高地上。共清理土坑竖穴墓110座。墓葬分为南、北两区,以北区墓葬为代表的遗存被命名为“水泉文化”。墓向多为西北—东南向,葬式皆为单人仰身直肢,有棺有槨,有殉牲的墓葬约占全部墓葬总数的1/3左右。种类有牛、猪、狗的头骨、蹄骨和下颌骨,只有一例使用了马的下颌骨,以猪最多。随葬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陶系,以器型较小的单耳罐、双耳罐、叠唇鼓腹罐和单把杯为主。该文化未见居住遗迹和生产工具,存在殉牲习俗,但墓地规模较大,且殉牲以猪为主,说明其具备定居民的特点。

敖汉旗铁匠沟A区的3座墓已遭破坏,仅知均为土坑竖穴墓,呈西北—东南向,分单人葬和双人葬两种。出土陶器火候不高。器型有瓮、碗、罐、壶。装饰品有野猪纹牌饰、虎形饰、鸟纹饰、带钩、圆形牌饰、带饰、铜泡、铃形饰、耳环、玛瑙珠、松石珠等。工具有环首刀。装饰品的风格有内蒙古中南部同期文化的特点。有学者曾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及葬俗等方面,将铁匠沟遗存划入井沟子类型^[38],说明两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对于其经济类型,目前合理的推断是,“铁匠沟墓地出土的野猪形、鸟纹等铜饰件,反映了山地森林民族狩猎业的文化特征”^[39]。

凌源五道河子遗存,共清理11座墓。墓地位于努鲁儿虎山南段东麓,非赤峰市所辖,但与我们探讨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域邻近,关系密切,故此列入。这批墓葬除一座为石槨墓,另外10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向在330°~350°之间。其形制与葬俗相当独特,墓穴一般前宽后窄,平面呈梯形,有的设二层台,墓底铺有一层桦树皮。出土遗物未见陶器,而以青铜兵器、工具、车马具、装饰品、乐器为组合。而对这批遗物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成分构成非常复杂,既有中原文化系统的武器,又有北方草原风格的装饰品,并受到邻近地区凌河文化和冀北地区的影响。为此,有人就指出,“这批遗存不宜归属辽西及其邻近地区目前所知的任何一种文化”^[40]。墓地不随葬陶器、车马具较为

发达、以马牙随葬、发现有铜镞、服饰品中发现有马形饰，这些特征表明其对马的重视，移动性较强，狩猎较为发达，这点与铁匠沟类似，故推测其经济形态可能亦带有较强的山地森林狩猎的色彩。

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了54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墓向呈西北—东南向。大多数墓穴中残留木制葬具。葬式大多仰身直肢，个别侧身直肢，还有合葬墓。部分墓早期遭扰动。殉葬马、牛、狗的头和蹄，M45葬具东南端及其外侧有马的头骨和四只蹄骨。大多墓主头端一侧放一件陶器。陶器皆为夹砂陶，分红色和褐色两种。均素面。陶器形状不匀称，表面常见刮痕，加工尤为粗糙。器类以罐为主，还有壶和鬲。服饰品有耳环、鸟形饰、联珠饰、铜泡、双尾铜饰、方扣、方形牌饰。M45头部保存有部分发辫，两耳有耳环，头顶和面部发现有钉缀铜泡和绿松石的麻布覆面，其上盖一扇蚌壳。颈部佩戴箕形蚌饰，颈、胸部散见黑、白串珠。腰部有两条革带，其中段下挂皮蔽膝。该墓地武器工具类有铜镞、长铤骨镞、铜锥、铜刀、铜匕。男性墓多在腿部随葬一束骨镞和铜镞，女性多随葬纺轮。原报告将周家地墓地的文化性质划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我们曾经指出，周家地墓地墓向均西北—东南向、有合葬墓、部分墓早期被扰、有用牲习俗、有的死者覆面或面部覆盖大蚌壳、随葬较多的长铤骨镞等，这些都与井沟子类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有别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的特征，不宜将其归入夏家店上层文化^[41]。该墓地殉葬马、牛的头和蹄，表明畜牧业经济成分的存在。骨镞和蚌饰的发现说明渔猎也是一种辅助性生计方式。而在墓地的中部发现有一建筑址，虽可能为祭祀遗存，但也暗示出其应有一定的定居性。

井沟子西区墓地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店乡敖包吐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发现有58座墓葬和2个灰坑。墓葬均西北—东南向，皆为土坑竖穴墓，平面多呈圆角长方形或窄梯形。未见二层台和葬具。除去保存较差的3座墓，其余55座墓中51座皆经扰动。有的墓完全扰乱，有的墓局部扰乱，其中尤以上半身被扰而下肢不动的情况最为多见。这批墓葬既有单人葬，又有双人葬和多人葬。其中单人葬21例，双人葬12例，三人以上的22例。死者大多仰身直肢，仅个别为侧身直肢。凡单人葬者，头向皆为西北；凡二人以上合葬者，亦至少有一人头向西北。

殉牲现象普遍。除去遭到破坏的3座墓，共50座墓出现动物骨骼，占墓葬总数的86.21%。殉牲种类有马、牛、绵羊、驴、骡、狗6种，共98个个体。其中以马最为多见（42.86%），其次为牛（22.45%）和绵羊（21.43%），不见猪。随葬牲畜只用某些部位，并非整体入葬。出现频率较高的是蹄骨，其次是股骨、肋骨、胸骨、下颌骨和头骨。这表明其流行以肉食随葬的习俗。这批墓多数被扰乱，所以出土牲骨也散落墓内各处。从未被扰动或扰动较轻的墓看，牲头和马、牛的股骨、肱骨等形体较大的部位多与陶器一起放置于死者头端，还见有下颌骨置放于填土中，蹄骨置于随葬陶罐中的例子。

有46座墓发现陶器，一般每墓1~3件，多者达6件，器类以夹砂带领罐为多。陶器一般放在死者头端。青铜器以装饰品为多，其中又以铜泡和耳环最为流行，不仅数量



图五 内蒙古东南部畜牧性质遗存随葬品情况

1、2.带颈罐（井M13：1、井M52：1） 3.瓮（铁M1：1） 4.四足鬲（井M19：3） 5.短颈罐（周M42：8） 6~8.

壶（周M1：4、铁M3：1、井M13：40） 9.碗（铁M2：3） 10.鬲（周M45：01） 11.叠唇单耳罐（井M13：39） 12.叠唇双耳罐（井M10：2） 13、14.铜泡（井M23：7、井M5：4） 15.变体鸟形饰（井M6：1） 16.铜耳环（井M3：57-1） 17.联珠饰（井M31：7） 18.坠饰（井M8：2） 19.双尾铜饰（周M2：3） 20.管状饰（井M20：10） 21、30.带沟（铁M1：29、五M9：14） 22.骨别子（井M3：59） 23.铜贝饰（井M7：11） 24.贝形蚌饰（井M3：15-1） 25.箕形蛤饰（井M21：25-1） 26.骨梳（井M3：20） 27.骨匕（井M15：11） 28.方形牌饰（周M45：59） 29.铜铃（井M20：22） 31.野猪交媾形牌饰（铁M1：9） 32.野猪形牌饰（铁M1：6） 33.卷云纹圆形牌饰（铁M1：14） 34.铜马牌饰（五M9：7） 35.革带钉缀双联泡（周M45：46、周M45：66） 36.方扣（周M31：10） 37、46.铜锥（周M45：32、五M1：25） 38、49~51.铜镞（五M9：18、井M26：20、周M45：1、周M42：7） 39.骨镞（井M3：58） 40、41.骨镞（井M26：13、井M3：54） 42.凸齿柄刀（周M45：53） 43.动物纹柄刀（周M31：2） 44.环首刀（铁M1：2、铁M1：3） 45.戈（五M1：43） 47.铜斧（五M1：6） 48.弓弭（井M3：38） 52.铜钺（五M1：15） 53、54.铜短剑（五M1：5、五M8：10）

（井：井沟子；铁：铁匠沟；周：周家地；五：五道河子）

多,出现频率也高。其他如“S”形卷云纹饰、管状饰、坠饰、双联泡等也较为流行。存在覆面习俗。青铜、玉石、蚌贝类的装饰品多集中在死者的头部、颈部、腰部、腕部。青铜工具武器类数量不多,主要是铜刀和铜锥,另有少量铜剑和铜镞,多置于腰部左右。骨角器比较发达,其中以镞居多。环、镰、扣、匕、别子、节约、弓弭等虽有一定数量,但出现频率低。骨角器中,约90%是用马鹿的角制作而成。骨镞以位于死者胸部和腰部附近居多。随葬骨镞明确归属者皆为男性。

由上述井沟子西区墓葬用牲墓的比例、殉牲种类与数量,以及未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和猪骨等现象看,畜牧业在该类型中当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墓葬的数量较多、陶器形体较大等迹象,又都暗示着定居的存在。故发掘者推测,“当时的牧民可能采取的是一种季节性游牧的生产方式”^[42]。而由殉牲以马最多、发现有少量鹿、獐、狐等野生动物、骨角器非常发达、骨器中以骨镞最多、发现许多蚌壳制成的蚌饰这些特点来看,足以表明渔猎业在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文化格局上,与井沟子类型文化面貌存在较多相似点的有铁匠沟遗存和周家地墓地,三者分布地域偏北,且均与水泉墓地的文化面貌存在较大差异,五道河子遗存又独具自身特点。与文化格局的多元化相对应,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阶段的经济形态亦呈现多种类型并存的情形。有农业定居的水泉文化,又有反映“山地森林民族狩猎业”的铁匠沟遗存和五道河子墓地,而井沟子类型、周家地墓地则以畜牧业占主导,以渔猎为辅。需要指出的是,内蒙古东南部及其邻近地区,除水泉墓地之外,畜牧业和狩猎业成分在诸类遗存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已成为区别于包括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内的其他区域的鲜明地域特征,此类经济形态,或可称之为“牧猎经济”。

3. 区域葬俗对比

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含畜牧业成分诸遗存各自特点鲜明,这也是我们展开对比研究的意义所在。对此,尚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对比研究不仅是研究差异性,其共同性更是研究的前提。其二,在已发现或发表遗存的数量上,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差距悬殊,而东南部材料丰富的唯有井沟子类型,这可能会成为研究的一个局限性。

同作为含畜牧业成分的文化遗存,两区域的契合点是显而易见的。墓葬形制上,绝大部分均为土坑竖穴墓,唯中南部的西园类型存在洞室墓和偏洞室墓。葬式以仰身直肢为多,个别地方存在屈肢的例子。两地墓葬都发现有葬具,但绝大多数的墓葬未见。以动物头蹄代表整牲的殉葬习俗都较为普遍,种类以马、牛、羊为大宗,都有以动物下颌骨、肩胛骨、肋骨等部位肉食随葬的习俗。井沟子类型和崞县窑子类型、毛庆沟类型都流行随葬陶器,且数量较多,多放于墓主头端。随葬品中都以服饰品为大宗,而种类上耳环、管状饰、铜泡、扣饰、联珠状饰、“S”形卷云纹饰、鸟形饰、绿松石珠、玛瑙珠等都是两地常见的。武器工具类中铜短剑、铜刀、铜锥、铜镞、骨镞、弓弭亦是两

地的基本种类。林沅先生曾对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北方系青铜器归纳出以下几点共性:①都随葬带扣、“S”形带饰、鹤嘴斧、斯基泰式短剑等北方系青铜器;②墓中都有殉牲,且基本都用头和蹄代表;③墓中常有弓弭和铜镞、骨镞;④墓中常在不随葬车器的情况下随葬铜质或骨质马衔和马镡^[43]。现在看,两区含畜牧业成分的遗存除在第1点上存在差异外,基本仍都符合,这也表明了整个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逐渐融合的趋势。

而两区葬俗方面的差异亦比比皆是。在墓葬方向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主要存在向东、东北、北三种朝向,而内蒙古东南部的井沟子类型、铁匠沟墓地和周家地墓地都是西北—东南向,这是比较独特的。葬法上,井沟子类型、铁匠沟墓地和周家地墓地都有合葬墓,其中井沟子西区墓地的合葬墓比例甚至达到了60%以上,这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大相径庭的。内蒙古中南部的崞县窑子类型墓葬流行设头龕和二层台,而在东南部地区除凌源五道河子发现有个别二层台外,其他地区则罕见。殉牲方面,井沟子西区墓地以马最为多见,达到42.86%,而中南部地区绝大多数地区都是以羊居多。井沟子类型驴、骡的驯养亦为其他地区所少见。内蒙古中南部的崞县窑子类型和毛庆沟类型随葬猪的例子不见于井沟子西区墓地。井沟子西区墓地发现的陶器以夹砂带领罐为多,出少量叠唇罐,而四足鬲和三足鬲比较有特色。陶器以素面为主。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崞县窑子类型和毛庆沟类型虽也流行随葬陶器,但其器形、纹饰相差较大。崞县窑子类型陶器以素面为主,另有绳纹、弦纹、刻划纹等。器类以双耳罐、双耳壶、鼓腹罐为多。毛庆沟类型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一种波浪折线纹。器型以绳纹鼓腹罐为大宗,另有素面罐和双耳罐。桃红巴拉类型出土少量带耳的罐和碗等,为素面的夹砂褐陶,火候很低。陶器面貌上的差异,很可能反映了人群来源和交往方面所呈现出的差异。服饰品方面,毛庆沟墓地重视对腰部的装饰,腰带饰发达,其常见的虎形牌饰、双鸟纹饰牌、鸟形饰牌等基本不见于东南部地区;而东南部地区重视对上半身的装饰,耳环、坠饰、箕形蚌饰、串珠、铜泡等组成的项饰较为发达。腰间装饰以铜泡最多,较为简单。尤为特殊的是,井沟子西区墓地和周家地墓地都发现有覆面的习俗。周家地M45发现的革带、蔽膝以及铁匠沟墓葬发现的野猪纹饰牌等都为本地所特有。东南部地区的井沟子西区墓地和周家地墓地均发现有起连接固定作用的骨别子,此类服饰品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未见,这也表明当时两地人的服饰存在差异。周家地M45墓主人发辫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当时人的发式提供了线索。武器工具方面,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多见的鹤嘴斧、双鸟回首剑不见于东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墓葬中骨角器发达,其中以长铤骨镞最多,也最有特色,而其90%左右是用马鹿的角制作而成的。

二、解 释

上述两个区域葬俗上的契合点与差别,为我们深入探讨当时两地经济类型的异同

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相似点方面,两地的经济类型都呈现多元化、区域化的特点,既有发达的畜牧业,又有农牧兼营或山地森林狩猎业,也有农业。内蒙古中南部的西区和东区也存在较大差异,西区的游牧化程度高于东区,且毛庆沟墓地可能属于农牧兼营,区域内也存在农业定居性遗址;而内蒙古东南部既有井沟子类型、周家地墓地以畜牧业为主导、渔猎业为辅的经济类型,也有铁匠沟A区墓地、五道河子那样的山地森林狩猎业,还有以水泉墓地为代表的农业。但是,两个地区还是存在差异的。就东南部来说,井沟子西区墓地的殉牲以马为主(马是狩猎的有力帮手),骨簪非常发达,骨角器绝大多数以马鹿角制作而成,发现大量的蚌饰。铁匠沟发现的野猪纹饰牌,周家地M45发现的皮革带、皮蔽膝、骨簪,都表明这个地区的经济类型具有浓厚的森林色彩,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含畜牧业成分遗存虽然也有马、马鹿、狐狸、骨簪等的发现,但渔猎业成分表现得不如东南部地区明显。这也是我们将内蒙古东南部及邻近地区的代表性经济类型称为“牧猎经济”的原因。

笔者之一曾在探寻内蒙古中南部文化多元化和经济形态多样化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为人群来源的复杂化、社会组织的小型性与分散化及环境背景^[44]三方面。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情况或许也与这几方面有关。

内蒙古东南部地处半湿润、半干旱向干旱区过渡的地带,对气候比较敏感,现今仍属于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45]。年平均降水量大致在300~400毫米,基本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域内多丘陵、平原、沙地,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根据相关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北方气候整体开始向干冷方向发展,长城地带原有农业文化的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西部的齐家文化分裂为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内蒙古中南部在朱开沟时期就显示了气候由暖湿向冷干变化和畜牧经济成分逐渐增长的趋势^[46]。而此时内蒙古东部则仍然保持了相对较为湿润的状态,因此夏家店下层文化才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农业文化,同时存在一定的畜牧业作为重要补充。但到了这一文化的末期,即距今3400年前后,该地区气候出现大的波动,并总体转向温干,风沙活动加剧^[47],这也直接导致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消亡。经过了约400年的文化间歇期,努鲁儿虎山以西才开始兴起夏家店上层文化。但相比夏家店下层文化,其农业较为粗放,畜牧业得到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将其称为一次“跃变”,原始农业文化开始让位于半农半牧的文化^[48]。而实际上,此时的气候相对来说仍是较为温湿的,较适合农业的发展,这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繁盛的内在原因。

距今2500年左右,东南部的气候再次变得冷干,这对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战国燕文化到来之前,该地域的文化发现如此之少。我们所知的类似水泉文化的农业遗存分布较为稀疏,铁匠沟A区墓地和五道河子墓地有明显的森林狩猎经济色彩,而井沟子西区墓地和周家地墓地则是与上述遗存明显不同的类型,可确定为以畜牧业为主,兼营渔猎。但是,根据对井沟子遗址采集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井沟子类型时期的孢粉分析结果看,它们的孢粉特征非常相似,前后两个时期并

没有明显变化,样本显示的是疏林杂类草草原植被景观。蒿/藜比值的大小总体反映了其湿凉偏干的气候类型。因此,这样的植被与气候类型既能支持旱作农业,又能满足从事畜牧和渔猎活动的需要。由这一点看,本地区畜牧业类型对欠发达农业类型的取代可能就与环境的变迁并无直接的关系^[49]。

另一方面,整个内蒙古东南部及其邻近地区地理环境的独立性与复杂性,即小范围的地理条件也是不容忽视的。实际上,西拉木伦河南北两侧的文化面貌历来就存在差异。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北部龙头山类型和南部南山根类型其文化特征就存在较大差异,北部文化面貌较为单纯,南部随葬的青铜器内涵复杂,种类繁多,既有地域特征鲜明的仿陶铜容器,又有成套的中原式青铜礼器,还有草原风格的武器、工具和各种动物牌饰^[50]。而两者的气候和环境也存在一些区别。龙头山类型是温凉偏干的气候,植被为蒿藜草原;而南山根类型是温和较干的气候,植被为稀树草原。反映在经济形态上,龙头山类型为低水平农业、狩猎,南山根类型为农牧、渔猎^[51]。

鉴于此,我们尝试对井沟子西区墓地、铁匠沟A区墓地、水泉墓地、周家地墓地和凌源五道河子墓地的地理状况进行考察。北部的井沟子西区墓地坐落于一处西北高、东南低的向阳坡岗上,背依高山,俯临河川,近旁有两眼泉水,水源十分便利,植被表现为山地疏林草原景观^[52],为畜牧业和渔猎业的发展都提供了较好条件。而南部的敖汉旗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努鲁儿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全旗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南部为低山区,中部为黄土丘陵区,北部为沙地区,简称为“南山、中丘、北沙”^[53]。铁匠沟墓地就处于南部山区与中部丘陵的过渡地带,水泉墓地处于低山丘陵地区,周围有较大范围的谷地,周家地墓地位于老哈河右岸丘岗的北坡,地形平坦。而凌源五道河子处于努鲁儿虎山南段的东麓,海拔较高。根据其地形,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①就发现的墓葬数量来看,处于南部海拔较高的山区的五道河子墓地和铁匠沟墓地,都要远远少于地势较为低平的水泉墓地和周家地墓地;②凌源五道河子墓地和铁匠沟墓地就经济形态上来看,山地狩猎色彩较为浓厚,而周家地墓地渔猎占有较重要地位,水泉墓地则以农业为主;③就文化复杂程度来看,无疑以处于辽东与辽西、冀北交汇点的五道河子最为复杂,铁匠沟墓地和周家地墓地较为简单。当然,这些从地理环境上总结出的一些现象,虽然表明环境对经济形态的形成应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也未必能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例如,周家地墓地所在地的土地与水源等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水泉墓地优越,但其农业经济成分明显弱于水泉墓地,而畜牧业经济特色却十分突出,这可能与人群对环境利用的主动性有关。上述井沟子西区墓地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区域内环境的细微差异在区域经济类型多样性的形成方面,也当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除去环境方面的原因,人群的迁徙流动可能也是造成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经济类型多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内蒙古中南部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主要存在两种古代人种类型,即“古华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54]。一直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

该地区的人种类型才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古代人种类型——与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颅骨形态特征相似的一类古代群体开始出现,即“古蒙古高原类型”^[55]。这一人种类型的出现,使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及经济形态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即我们上文所说的文化格局多元化与经济形态多样化。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情形与此类似。据朱泓先生研究,东北地区先秦时期的居民按其主要的体质特点大体上可归纳为两个古代人种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56]。而从汉代开始,东北地区的人种地理分布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主要是增加了一种新的种族类型因素,即西伯利亚(北亚)蒙古人种因素的出现。而随着井沟子西区墓地的发现,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接近的古蒙古高原类型人种出现的年代可以提早至春秋晚期。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就目前来看,井沟子西区墓地所代表的人群最有可能是文献所记载的自更北地区南下的东胡。这批南下的具有北亚蒙古人种特征的人群原本就是游牧人^[57],这给内蒙古东南部的经济类型带来了一场变革,原来该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主或依附于农业的半农半牧,但是这批人群的到来,使其经济类型更为复杂。他们根据各地自然条件和风俗传统,发展出了各具特点的生计方式。井沟子地区和周家地具有丰厚的水草资源并靠近林区,使得他们得以采取以畜牧业为主,兼营渔猎的经济形态;以铁匠沟墓地和五道河子墓地为代表的人群,地处山区,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因此它们具有较为浓厚的森林狩猎业色彩,而且五道河子因其地理位置因素,劫掠可能也是其生存的一种手段,但是他们是否属于东胡,由于缺少人骨材料,暂且不论;水泉墓地的经济形态与上述各地区大相径庭,属于定居性农业。

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之所以会存在森林狩猎色彩浓厚的经济类型,应与该地丰富的森林资源有关,并且狩猎作为一种生业手段在该地区是由来已久的一种传统。大兴安岭、努鲁儿虎山、七老图山这些大型山脉及其余脉,再加上区域内部一些低山丘陵,都提供了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就上述遗址已发现的野生动物种类来看,就有野猪、马鹿、老虎、狐狸、獐等较大型的动物。早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就发现有野生的鹿科的狍、麂和兔,但狩猎业在其生活中无足轻重。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林西大井铜矿遗址较为集中出土了一批野生动物遗骸,种类有鹿、麂、野马、野牛、狼、狍、狐、兔、熊、野鸡等^[58]。而至年代更晚的乌桓、鲜卑之时,狩猎业仍扮演着重要的地位。《魏书》中对乌桓人的生计活动,曾有这样一段记载:“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59]。而王明珂先生通过对汉晋文献的分析也发现,乌桓人相当依赖牧业之外的生计活动,特别是狩猎,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要远远大于匈奴与西羌^[60]。从史籍上所载老虎、豹、貂等动物皮毛是乌桓、鲜卑人狩猎所得的特产,就可从侧面知道其狩猎业的发达。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如铁匠沟A区墓地、凌源五道河子墓地和井沟子西区墓地人群采取的渔猎生产方式,既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一种积极有效利用,又延续了当地早期人群的传统。

而春秋战国之时东南部地区狩猎业的发展,与驯马技术的进步亦息息相关。马不

仅放牧时可以充当坐骑以利于控制和保护羊群,同时也是牧人狩猎时的帮手,当然也常被用作战争和劫掠的工具^[61]。林沄先生很早就已指出,骑马术和马车显然都是外来的,在其传入的过程中,北方长城地带首当其冲^[62]。已知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了大量车马器,种类有銜、镳、铃、轭等^[63],表明当时人已熟练掌握了骑马术。而从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东南部及邻近地区上述几处墓地的发现来看,马所起的主要作用似乎存在一些细微区别。井沟子类型的马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复杂,除用作放牧和骑射工具外,似乎还是提供肉、奶的主要畜种;铁匠沟和五道河子似乎更多的是用其狩猎。从五道河子发现大量的兵器和车马器的情况来看,马似乎还是其进行劫掠的工具。

实际上,内蒙古中南部与东南部地区尽管在经济类型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就形成机制上它们则是异曲同工的。我们知道,“游牧,就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64],它是牧民的一种灵活积极的生存适应策略。因此,为了充分利用环境,游牧民族尝试不同的牲畜组合,不同的季节迁徙方式,并采取具有地域特色的辅助性生计手段(如东南部地区渔猎业占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游牧民族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其与中原的碰撞、冲突、融合关系得以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千年而不衰的内在原因。

三、结 语

以上我们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两个地区含畜牧业成分诸遗存的葬俗对比,总结出了两个地区在经济类型上的异同。相同之处在于,两个地区的经济形态都呈现区域化、多元化的特征;而它们最大的差异则是,内蒙古东南部渔猎业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有的遗存中可能达到与畜牧业并重的地步,而这也是我们将其称为“牧猎经济”的主要原因。其后,我们从区域微地理环境和人种来源两个角度,尝试着对内蒙古东南部经济类型的多元化特点进行了解释。而对于该地渔猎业成分突出的特点,我们将其原因归结为自然环境的优势、传统习俗及驯马技术的进步等方面。

本文所做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对区域间经济类型的对比,然而,一个游牧社会的形成及维系实际上是一种“专化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与外在世界的互动模式”^[65]。因此,就区域间含畜牧业成分遗存的对比这一课题来讲,还有许多值得我们进行挖掘的问题,如社会结构、与其他文化的交往、服饰装扮以及意识形态等。

注 释

[1] 王立新. 秦统一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多元化及其历史背景[A]. 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61.

- [2] 曹建恩, 孙劲松. 内蒙古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制的初步研究——以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的墓葬资料为中心 [N].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10-9-39 (5): 65~75.
- [3]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A]. 林沄学术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39~76.
- [4] 畜牧, 就一般意义上来说, 指的是人们通过驯养动物来获取生活所需, 是人们利用自然的一种生存策略. 而我们使用“含畜牧业成分遗存”这一概念, 是出于谨慎的考虑因为在文中的探讨过程中, 如水泉墓地经济类型属定居农业, 畜牧业也以猪为多; 毛庆沟墓地经济类型则为农牧兼营, 对于此种例子, 无论我们使用“畜牧”还是“游牧”之类的概念都欠妥当. 但除此特例之外, 为叙述方便, 文中更多采用“畜牧”这一措辞, 当不致引起明显偏差.
-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28~29.
- [6] a. 王立新. 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3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84~95.
b. 朱泓. 东胡人种考 [J]. 文物, 2006 (8): 75~77+84.
- [7] 本文所理解的葬俗包括墓向、墓葬结构、葬式 (单人或多人, 摆放姿势等)、用牲状况 (用牲墓比例、用牲方式、用牲种类、数量与位置)、随葬品 (随葬品组合及放置位置、随葬陶器墓比例、陶器种类与数量、随葬服饰品、武器工具、车马器等的种类与数量) 等方面.
- [8] a. 田广金, 郭素新. 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 [A]. 北方考古论文集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160~199.
b. 田广金. 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A]. 北方考古论文集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00~214.
- [9]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101~104.
- [10] 乌恩. 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 [J]. 考古学报, 2002 (4): 437~470.
- [11] 林沄. 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 (1、2合刊): 16~26; 后收入林沄. 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 [A]. 林沄学术文集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368~386.
- [1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包头市文物管理所. 包头西园春秋墓地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1 (1): 13~24.
- [1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发掘简报 [J]. 考古, 2009 (3): 3~14.
- [14] 曹建恩. 内蒙古中南部商周考古研究的新进展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6 (2): 16~26.
- [15] 材料未正式发表. 简介见张全超.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75.
- [1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凉城崞县窑子墓地 [J]. 考古学报, 1989 (1): 57~81.
- [1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 [J]. 考古, 2009 (3): 28~47.
- [18]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毛庆沟墓地 [A].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27~327.

- [19] a.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凉城县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4(3): 26~32.
b.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 饮牛沟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A]. 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78~327.
- [20] 田广金. 桃红巴拉墓群[A].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03~219.
- [21]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西沟畔战国墓[A].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351~365.
- [22] 内蒙古博物馆,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玉隆太战国墓[A].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366~371.
- [23] 曹建恩, 孙金松. 中国北方地区东周西汉时期偏洞室墓葬研究[A]. 中国史研究(第53辑)[C]. 首尔: 2008.
- [2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 饮牛沟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A]. 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78~327.
- [25] 王立新. 秦统一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多元化及其历史背景[A]. 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71.
- [26]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115~115.
- [27] 杨建华. 内蒙古地区东周时期东西区的差异及相关问题[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6(2): 55~60.
- [28] 张全超.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主人骨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11~25.
- [29]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 2009(3): 15~25.
- [30] 塔拉, 梁京明. 呼鲁斯太青铜器墓葬[A].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23~226.
- [31] 崔利明. 内蒙古兴和县沟里头匈奴墓[J]. 考古, 1994(5): 473.
- [32] 王立新. 秦统一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多元化及其历史背景[A]. 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78.
- [33] 郭治中. 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A]. 张忠培, 许倬云.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34] 邵国田. 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调查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1、2合刊): 84~90.
- [3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凌源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89(2): 52~61.
-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 1984(5): 417~426.
- [3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38] a. 赵宾福. 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探讨[A]. 边疆考古研究(第5

- 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57.
- b.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24.
- [39] 邵国田. 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调查简报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 (1、2合刊): 84~90.
- [40] 王立新. 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 [J]. 考古学报, 2004 (3): 243~270.
- [41] a.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 [J]. 考古与文物, 2004 (1): 6~19.
- b. 王立新. 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3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84~95.
- [4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28~29.
- [43]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A]. 林沄学术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65.
- [44] 王立新. 秦统一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多元化及其历史背景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10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79~186.
- [45] 田广金, 史培军.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7 (2): 44~51.
- [46] 田广金, 郭素新. 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 [A]. 北方考古论文集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160~199.
- [47] 王立新. 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 [J]. 考古学报, 2004 (3): 243~270.
- [48] a. 杨志荣, 索秀芬.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环境考古研究 [J]. 环境考古研究 (第2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81~88.
- b. 李水城. 西拉木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1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269~287.
- [49] 塔拉, 王立新, 汤卓炜, 张淑芹. 井沟子遗址所反映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4 (1): 85~88.
- [50] 朱永刚. 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 [J]. 考古学报, 1998 (2): 133~152.
- [51] 汤卓炜. 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和生态环境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9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247~257.
- [52] 塔拉, 王立新, 汤卓炜, 张淑芹. 井沟子遗址所反映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4 (1): 85~88.
- [53] 刘明光. 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0: 177~178.
- [54] 朱泓. 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1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2002: 301~313.
- [55] 张全超.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主人骨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73~89.
- [56] 朱泓. 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J]. 文物季刊, 1998(1): 54~64.
- [57]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A]. 林沄学术文集(二)[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65.
- [58]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J]. 文物资料丛刊, 1983(7): 39~48.
- [59] 陈寿. 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M]. 注引自王沈.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832.
- [60] 王明珂.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01.
- [61] 杨建华. 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习俗比较[A]. 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166.
- [62]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A]. 林沄学术文集(二)[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63.
- [63]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5(1): 117~140.
b. 赤峰市博物馆等. 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简报[J]. 文物, 1995(5): 4~22.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 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J]. 考古, 1981(8): 304~308.
- [64] 王明珂.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
- [65] 王明珂. 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五本, 第二分, 1994.

The Comparison of the Burial Custom of the Including Animal Husbandry Relics in the Mid South Part and the Southeast Part of the Inner Mongolia in the Eastern-Zhou Dynasty and Related Problems

Wang Lixin Hu Pingping

By comparing the burial custom of the including animal husbandry relics in the mid-south part and the southeast part of the Inner Mongolia in the Eastern-Zhou Dynas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i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economic type. We learn that their economic form both display the character of region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Nevertheless, one thing to be noted, hunt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eople's daily life in the southeast part of the Inner Mongolia, even in some sites it is equal to th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why we call it "husbandry hunting economy". And then, as to the character of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conomic type in the southeast part of the Inner Mongolia, we attempt to explain it in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ethnic origin. In terms of the outstanding role of hunting here, we attribute it to the advantag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custom and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riding horse, and so on.